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李家钰：“不灭倭寇誓不还”的川军将领



李家钰雕像。

新华社发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大兴镇炉坪村，矗立着一座军人的半身雕像，目光炯炯，凝视远方。雕像旁侧便是一代抗日名将李家钰将军陈列室。

“当年他本可随大部队撤离，却毅然率部坚守阵地，为友军争取撤退时间。”炉坪村党委副书记刘文军向

前来悼念英烈的人们，动情讲述李家钰以身报国的感人事迹。

李家钰，1892年生于四川省蒲江县大兴场（今大兴镇），1909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堂第四期，又先后在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和南京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学习。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7军军长的李家钰义愤填膺，请缨杀敌。

“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1937年9月，李家钰接到出川抗战电令后，在抗日动员誓师大会上以诗言志，后率47军所辖104师、178师约1.8万川军将士从西昌出发，着单衣草鞋，长途跋涉，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抵御日寇的攻势。

李家钰率领的川军虽军械装备简陋，却以悍勇坚韧闻名。

1938年春，装备精良的日军108师团和104旅团，进犯山西东阳关及长治城。李家钰率川军将士据守东阳关三昼夜，后因伤亡过重，弃守东阳关。随后，日军集中火力，又向长治城发起强攻。在飞机大炮轮番轰

炸下，长治北门陷落。将士们凭血肉之躯与日军在城内展开肉搏巷战，血战两昼夜，川军弹尽粮绝，撤出了长治城。

东阳关和长治城两战，打出了川军英勇威武的气概，重挫日军嚣张气焰，敌我伤亡均在千人以上。李家钰的部下黄开仁曾回忆，日军在武器上占尽优势，但川军将士顽强抵抗。战斗中炮击持续不断，山头草木被焚为灰烬，很多士兵的军衣军裤被火焰烧得破碎。长治保卫战也被称作“山西东南角抗战中最悲壮的一幕”。

在驻防长治时，李家钰等与八路军一支炮兵部队联防守城，其间，与八路军结下了深厚友谊。1938年1月，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途经长治，李家钰请他向军官讲授抗日游击战的重大意义和战略战术。

在国家大义面前，李家钰抛下党派之别，一心报国，始终秉持国共团结抗日的信念。

1944年，日军调集14万精锐兵力发起豫中会战，先后占领郑州、许昌、洛阳等地。李家钰奉命率部阻击日军，掩护40多万友军撤退。5月21日，

在陕县秦家坡旗杆岭，李家钰与200余名官兵遭遇日军伏击，激战中，他身中数枪，壮烈牺牲，年仅52岁。

“当年跟随父亲一同回家的有遗笔和血衣。”李家钰之子李克林回忆着永生难忘的一幕。装遗笔的玻璃框里，是一幅李家钰的题字：“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而装血衣的框里，则挂着他牺牲时的戎装，“军装已被血浸透，满是枪痕。”李克林说。

“李家钰将军用生命践行的爱国誓言，就像旗杆岭上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着后人前行的路。”每当讲起李家钰的事迹时，刘文军心中都满是崇敬。

如今，炉坪村的李家钰将军陈列室内，摆放着李家钰的家世谱系、书札信函、题词追赠等史料，这里已然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年5月，李家钰的子女李克林和李培蓉都会到此缅怀父亲。“父亲为了国家大义，义无反顾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并为国捐躯，他英勇抗战的英雄气概，也成为我们传承不断的家族精神。”李培蓉说。

（据新华社）

姚名达：从史学大师到抗战英烈

在江西师范大学青山湖校区里，一座“显微亭”坐落在校园小湖的东南角，四周文竹、冬青耸立。四根红柱撑起的亭廊内，高悬一块石刻牌匾，讲述着“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姚名达的生平事迹。

姚名达，号显微，江西兴国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毕业后，他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任编辑兼特约撰述，之后还曾执教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

1935年，姚名达与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平、津、沪相继沦陷后，他返回江西，仍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所撰《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为我国现代目录学研究工作开山之作。1940年，国立中正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创办，校长胡先骕特聘其为研究部研究教授。

日军在赣西上高战役受挫后，于1942年疯狂发动了赣东之战，战火蔓延到丰城、樟树等地。姚名达目睹日军猖獗、山河破碎，他在国立中正大学师生大会上大声疾呼：“到前线去，到战壕中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随后，他组织成立了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并任团长，率团员30余人奔赴抗日前线。

在战壕里，他们亲切慰问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在野战医院里，他们的医疗小分队精心治疗伤病员；在群众中，他们热情宣传抗日救国。

1942年7月，在樟树前线的野战医院对伤兵进行慰问和护理后，姚名达率领的战地服务团因遭遇日军突袭，被迫分散突围。7日天亮，枪炮声渐

息。因遭受雨淋，有人发了高烧，大半天还没走上30里路。他们不得不放弃原计划，改走水路。

夕阳西下，姚名达一行来到石口村头，他们正在村中祠堂休整时，日军却突袭而至。战地服务团的师生们赤手空拳和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展开殊死搏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姚名达打死了一个日本兵并夺得一支枪。正当他准备持枪上楼抢占有利地形时，被一个日本兵开枪击中倒地，另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刺进他的胸膛。这位史学大师不幸牺牲在抗战前线，时年37岁。

姚名达临难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为国捐躯的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位直接参战并壮烈殉国的大学教授。

2023年，姚名达烈士纪念馆在吉

安市新干县建成，近年来周边中小学生陆续前来瞻仰。记者近日走访看到，孩子们排成整齐的队列，听志愿者讲解这位从军教授的革命故事。新干县溧江镇石口村党支部书记张银如说：“我们是听着姚名达烈士的故事长大的，现在也要讲给下一代听。今年清明节前后，就有上千人前来参观。”

姚名达教授的事迹深切激励着赣鄱大地上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前不久，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内，来自南昌大学的学生吴之栋阅读着姚名达的展板，正在考取教师资格证的他，立志追随姚名达的脚步，他说：“姚名达教授既有学术建树，又有爱国担当，是我们当代学子的榜样。”

（据新华社）

“活宝”赵子岳创作抗日歌曲

赵子岳（1909年-1997年）是老一辈电影表演艺术家，所塑造的各种不同人物形象，都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是一位德艺双馨、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早年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就被人们誉为“活宝”之一，他的表演严肃又乐观，纯朴又幽默，憨厚又风趣。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哪里有什么，哪里就有欢乐的笑声。

赵子岳从小深受民间音乐、地方戏曲的熏陶和影响，会弹三弦，拉二胡，吹笛子、唢呐，执起双锤就能打鼓。他还能写歌作曲，1939年冬，他写了一首《告国民党军歌》，词曲都是他创作的。当时太行山剧团奉命到辽县（现左权县）开展农村工作。住在寿坪村，离村不远有个拐儿镇，那里住着国民党军队，他们欺压老百姓，不积极抗日。为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宣传，太行剧团到拐儿镇作慰问演出，适逢群众游行示威进行反顽固派的说理斗争，赵子岳为此写下这首《告国民党军歌》：

军民本是一家人（不错），团结起来打日本，为什么打骂老百姓？唉！破坏团结绝不容！柴草粮秣给你送（不错），民众的责任应当尽，违反了军纪乱形势，唉！群众痛苦怎么忍！群众利益无保证，大家请愿来质问，壮大的队伍向前走，唉！不达目的誓不停！

整首歌曲调有力流畅，表现了人民群众的高昂愤慨情绪，有民歌特色，易学易记，很快传开。对发动群众和警告国民党官兵不要欺负老百姓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抗战时期，他说过相声，表演过双簧，而他的口技更是一绝。1939年2月，在长治市成立了山西省民族革命艺术学校，4月举行“戏剧运动周”，有几十个剧团，分两个舞台轮流演出。有一天晚上在长治师范礼堂演出京剧《捉放曹》等剧目，晚会结束后，有人问赵子岳：“赵老师，怎么不见你演啊！”

他非常严肃地说：“我演啦！你们没看见？”大家莫名其妙地说：“没有啊。”他说：“哎，我在《捉放曹》中，在台上叫了两次，叫的声音那么大！你们就没听见？”大家想了半天，不知谁猜着了说：“啊呀！赵老师你装扮的猪呀！”他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是在幕后学猪叫，将捉猪时的叫声、被捆时的叫声、杀猪时的叫声、猪临死前的叫声，学得很真，难怪人们在舞台上看不到他。（据《北京青年报》）

2000多年前竟有环保灯具



▲西汉 长信宫灯。

▼西汉 彩绘雁鱼青铜缸灯。



如今，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殊不知，早在2000多年的汉代就用上了环保灯。

两汉时期，青铜灯在贵族中逐渐流行，其燃料多为动植物油脂。这类油脂，尤其是动物油脂燃烧时，会产生大量烟尘与难闻的气味。于是，一种带有导烟结构的新型灯具“缸(gāng)灯”应运而生。长信宫灯与彩绘雁鱼青铜缸灯就是其中的代表。

“缸”是指导烟管，“缸灯”就是导带烟管的灯，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黑烟灰而保持清洁。

长信宫灯造型是一位跪地持灯的汉代年轻宫女，她跣(xiǎn)足跪坐，两臂之间托持一盏带罩铜灯，姿态恭谨而优雅，将汉代宫女的日常姿态定格在灯具之上。

这盏灯的玄机藏在宫女右臂宽大的袖管里——宫女右臂看似在挡风，实则是导烟管，使灯烛点燃后产生的烟气徐徐上升，进入宫女袖管，再导入宫女体内，以保持宫殿内清洁。

更显巧思的是，灯具由头部、身躯、袖管、屏板、灯盘及灯座六部分组合而成，每部分皆可简便拆解重装，移动与清理内部积灰都非常方便。灯罩由两片弧形铜板构成，其中一片能左右滑动，可自由调节光照角度与明暗，可以说是2000多年前的“智能台灯”。

彩绘雁鱼青铜缸灯，则呈现为一只回首衔鱼伫立的鸿雁，造型灵动且富有生趣。鱼身与雁颈中空相通，构成烟道。灯烛烟气经由鱼身进入雁颈，最终汇入中空且注有清水的雁体。清水可溶解部分烟气，其余烟垢则附着于管道内壁，以达到集烟减污的效果。同样巧妙的是，这盏灯的各部件也均能拆解，方便清除烟渍。灯盘与灯罩也均可灵活转动，用以调控光照角度与亮度，使用非常便利。

这两件铜灯表明，汉代青铜制器开始向实用化、科学化和艺术化等兼具的方向发展。

（据《科普时报》）

太医就是御医吗

太医和御医在今天老百姓的话语系统中大概是一回事。而考究这两个词的原本意义，或许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点细微的差别的。

首先，御医是指真正为皇族诊治疾病的大夫，一般而言，这部分医疗人员属于皇家的私人医生，不给外人服务，除非皇帝派遣他们去给某个指定的对象诊病。在历史文献中，宫廷医官在给皇室诊病时被称为御医，平时则称其官职名——太医。

太医，应该说有两个意义：一是指一个职官系统，这个系统有两个主要功能，为皇室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管理皇室下辖的医疗保健系统；二是指由“太医”这一职官系统中供职的工作人员所构成的特殊群体，比如说太医职官系统内，分管药物的、分管处方的、分管植物园的等，都可以泛称为太医。（据《联谊报》）

历史的罪证

——侵华日军“七年式”305毫米榴弹炮



“七年式”榴弹炮6门，其他型号1门。火炮阵地设在村旁的“军用地”里，日军不允许村民在这里种庄稼。火炮阵地架设完毕后，每隔一至两个月就会进行试射，日军叫作“演炮”，一般间隔半小时左右发射一次，每次持续一天或两天。“演炮”时，为防止操炮的秘密泄露，村子的四个角都有日军把守，不允许靠近，也不允许观看。半年后，日军又逼迫村民全部搬走，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村民才重新搬回何家沟。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门火炮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由于历史原因，当年在何家沟的6门“七年式”305毫米榴弹炮仅剩这一

门存世。1997年11月，这门火炮由黑龙江阿城市征集调运至原中国民兵武器装备陈列馆（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通州分馆）。这门火炮在征集时主体较完整，但由于许多零部件丢失和损坏，展出前由原沈阳炮兵学院进行了部分功能性修复。1998年8月1日，这门火炮正式对外展出。

在日军手中，这门火炮给我们带来了无法抹除的深重苦难。如今，它作为历史的罪证陈列在博物馆，亦是提醒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尤其那段国土沦丧、灾难深重的历史，吾辈更应铭记于心，时刻不忘自强奋进。（据《学习时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北黑土地上的 一门火炮前，总能遇到有人合影，其中不乏来自日本的老者。这门火炮是日军侵华的铁证，也是国内留存二战时期口径最大、吨位最重的榴弹炮，目前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通州分馆。炮尾位置清晰可见“七年式三十 厘长榴弹炮，昭和15年，大阪陆军造兵厂，NO.20”的铭文。可以看出，这是一门日本“七年式”305毫米榴弹炮，日本昭和15年，即1940年，由大阪陆军兵工厂制造，编号为20。

1939年7月诺门坎战役中，在哈拉哈河东岸日本关东军与苏军的装甲车辆对战时，日军的坦克装甲防护薄弱，火炮穿甲能力不足，战斗中除步兵使用燃烧瓶造成苏军装甲车辆被毁外，其他反坦克手段有限，日军开始对苏军的装甲力量产生畏惧。而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军就曾从日本国内调集18门28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帮其攻下了中国的旅顺港。为防备苏军南下，日军又想到通过筑全部署大口径榴弹炮的方式进行防御。如在虎头要塞除了“七年式”榴弹炮，日军还曾经安装过1门41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是当时在伪满洲国部署的最大口径要塞炮。

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凌晨，苏军开始向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黑龙江地区是苏军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区。苏军强渡乌苏里江，于10日

占领虎头镇，虎头要塞围歼战持续到26日结束，歼灭日军3000多人。战后，要塞内最大口径的榴弹炮被苏军缴获，具体去向不明。国内现唯一存留的这门日本“七年式”榴弹炮当时由侵华日军部署在现在的哈尔滨阿城区何家沟村，主要用于封锁破坏绥哈（绥芬河至哈尔滨）铁路和沿线的公路，以及保护该炮阵地附近焦家岗一带的军用物资仓库。

“七年式”榴弹炮于日本大正七年（1918年）定型，口径305毫米，主要有长、短身管两种型号。现存“七年式”榴弹炮整炮长9.5米，身管长7.22米、重19.76吨，属于长身管型。火炮底座呈圆形，直径5.5米，高约0.9米，由三层钢板组成，装有齿轮和钢轨，炮身可以随意旋转和横向移动。整个固定式火炮的总重量97.7吨，该型火炮还可以采用移动式底座部署，总重量约123吨。弹药主要有榴弹和破甲榴弹两种，弹头部分重达400千克，初速500米/秒，射击时身管后坐行程1米，最大射程15.2公里，可侵彻半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或一米的普通混凝土结构。

当年在阿城城东大约5公里处的何家沟，因为村边设有日军的巨炮阵地而被老百姓称作“炮屯”。1938年日本关东军驱使中国人做苦力在何家沟修建兵营，两年后完工。大炮通过铁路运到村边，再由装甲车辆拖运至火炮阵地，搭建火炮阵地和安装大炮的工作由日军完成，7门火炮的炮位之间相距500米至1000米，其中有